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宗教與哲學】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

王季同／著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王季同◎著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 / 王季同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 許嘉璐主編)

ISBN 978-7-203-08761-8

I. ①佛… II. ①王… III. ①佛學—關係—科學 IV. ①B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34701號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

主 編 許嘉璐

著 者 王季同

責任編輯 梁晉華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 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4956038(郵購)

E-mail sxsccb@163.com 發行部

sxsccb@126.com 總編室

網 址 www.sxsc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00mm×970mm 1/16

印 張 5.5

字 數 46千字

印 數 1—3000冊

版 次 2014年12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03-08761-8

定 價 14.00圓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編委會

總主編 許嘉璐

編委會 王紹培 王繼軍 許石林 李明君
汪高鑫 趙勇 梁歸智 樊綱
(按姓氏筆畫排序)

總策劃 越衆文化傳播·南兆旭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李廣潔

副主任 姚軍 石凌虛

委員 周威 梁晉華 徐勝 顏海琴
張文穎 秦繼華 馮靈芝 張潔

設計總監 李尚斌

設計製作 王秀玲 何萬峰 歐陽樂天

| 出版說明 |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選取一九四九年以後未再刊行之近代名家學術著作共一百二十冊，編例如次：

一、本叢書遴選之著作在相關學術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學術研究方向、方法上獨具特色。

二、為避免重新排印時出錯，本叢書原本原貌影印出版。影印之底本皆經專家組審定，原書字體大小，排版格式均未做大的改變，原書之序言、附注皆予保留。

三、本叢書分為八大類，以作者生卒年編次。

四、為使叢書體例一致，本叢書前言後記均採用繁體字排版。

五、個別頁碼較少的版本，為方便裝幀和閱讀，進行了合訂。

六、少數學術著作原書內容有個別破損之處，編者以不改變版本內容為前提，部分進行修補，難以修復之處保留缺損原狀。

七、原版書中個別錯訛之處，皆照原樣影印，未做修改。

八、所選版本之抽印本頁碼標注，起始至所終頁碼均照原樣影印，未重新編排標注新頁碼。

由於叢書規模較大，不足之處，殷切期待方家指正。

—總序—

披沙瀝金，以爲鏡鑒

◇ 許嘉璐

多年來有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中盤桓：爲什麼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中國的各個學術領域竟涌現了那麼多大師級的人物？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現象，我認爲，如果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撰寫的近代學術史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缺乏靈魂的。後來我知道，著名人類學家克羅伯曾提出過一個問題：爲什麼天才成群地來？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並非中國所獨有，思考其所以然的也大有人在。而在那一次世紀之交中國的情況，似乎應驗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錢學森先生曾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問：爲什麼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不了杰出人才？後來人們稱這個問題爲“錢學森之謎”。

要回答這些疑問不是件容易的事。與其迅速地囫圇地探尋，不如先多了解那些讓中國近代學術（應該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史上閃耀着光輝的大師們的作品和自述，從而在腦海里盡量“復原”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在那種環境下的心理路徑，從中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啓示。

有一點是顯然的，這就是他們雖然都已遠離塵世而去，但是他們獨立思考的品性、求知治學的真誠、困厄窮愁中對節操的堅守，恐怕是他們共同的主觀因

素，一直影響到現在，而且將會永遠留存下去。

就思想界、學術界而言，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一個新說和舊說碰撞，中學和西學融匯的大時代。那時的學人極為重視言行操守，同時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他們的學術研究十分純淨，絕少功利因素；他們的視界開闊，以包容的心態和嚴謹的風格造就了成果的大氣與厚重。至於在客觀因素一面，他們實際是在用工業化時代的事實解說着太史公所說的名山之作“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因困苦難使得他們“皆意有所鬱結”。這種鬱結，幾乎和個人的名利毫無牽涉，他們永遠不能釋懷的，是民族的存亡、國運的興衰、民衆的福禍和文脈的續斷。

那個時代也是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西古今學術調適、創新的時期，學術方法上的交互滲透和融合、創新亦可謂“於斯爲盛”。斯時之學人是要在封閉的屋牆上鑿出窗子的勇士，是使人能够看看外部世界的第一批導夫先路者；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在“意有所鬱結”時“彷徨”和“吶喊”的“狂人”。

相對於那時的哲人們，後來者是幸運兒。現在的形勢是，近三十年來學界空前繁榮，衆多學科有了長足之進，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學界有了更新穎、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似乎接續上了百年前的學壇盛事。但細想想，“古”與“今”還是有差別的。其異，主要不在於世界情勢、學術進展、工具改善這些客觀存在，而在於在廣泛吸收各國優長的同時，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越來越受到重視，換言之，“拿來主義”已經延長了“拿來”的程序，加上了試用、甄別、篩選、吸收、融合、成長。就我孤陋所見，在當今地球上，面向所有異質文明，努力汲取我之所缺，其範圍之大和心態之切，似乎無出中國之右者。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已經超越了前輩。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學術，特別是人文學科，其職業化、“沙龍化”和功利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浮躁病却嚴重了。從這個角度說，是不是我們已經退得够可以的了？而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出不了大師的原因之一呢？

民國學術界的特點之一是極爲注重對傳統的反省、批判與繼承。他們對傳統文化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整理和研究。一方面，由於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學者們擔起了讓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他們要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挖掘來重振民族自信心。這一時期對傳統文化進行整理的全面而深入是前所未有的，舉凡文字學、語言學、經濟學、法學、哲學、政治制度、書法繪畫、金石學……規模之宏大，研究之精微，令人嘆爲觀止。

民國學術推動了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在對傳統文化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理念，推動和建立了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例如，在對語言文字和音韻學成果進行整理、研究的基礎上開始着手規範之，建立了國語學；深入研究書法、國畫，將其融入了現代美術學科；在廢除舊有學制後逐步建立起小、中、大學較完整的科目和學科體系。

民國學術也改變了傳統學術方式，建立了新的研究範式。以現代科學考古爲發端，科研的實踐和成果使中國知識界真正認識到在實驗、比較基礎上的邏輯分析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推進了中國學術的一大演變。至於我們常說的打破士大夫傳統、走出書齋到田野鄉村和市民中進行調查研究、結束了經學時代、以歷史眼光檢視儒學和諸子等等，都是確立新學術範式的努力。這一轉變，也標誌着中國學術界脫胎換骨，全面進入了現代，爲此後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西方啓蒙運動以來，在“現代性”和“現代化”裏潛伏着的缺陷和謬誤也傳到了中國，這些不能不在前哲的著作裏留下痕迹。這並不奇怪。類似的情況，古往今來孰能免之？猶如今天的我們，誰敢自稱我之所見就是永恒的真理？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時代所異者，或許就在昔時大家創立新說或譯註西學著作，往往是懷着對學術和前哲的敬畏而爲之，故而常常誤不在我；當今則往往出於對學問和他人的輕蔑，或以所研究的對象爲謀己的工具，因而難辭主觀之咎吧。翻閱他們的

心血之作，這些復雜的狀況可以顯見，可以視之爲我們的一面鏡子。

滄海桑田，世事變幻，歷史的動盪和時代的遮蔽，使當年許多大師的一些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被棄於故紙堆中，不能不令人有遺珠之憾。爲此，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惜以數年之艱辛，披沙瀝金，編輯出版這套《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凡一百二十冊，計文學、史學、政治與法律、美學與文藝理論、民族風俗、宗教與哲學、經濟、語言文獻共八大類別。所選皆爲作者之純學術著作，無論是其見解、精神，抑或是其時代烙印，都是後輩學人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他們出版這套叢書，意在讓世人不忘來程，知筆路藍縷之不易，爲民族文化的傳承再增薪木。

出版社的初衷，與我近年來所思所慮近似，故願略述淺見於書端，以與策劃者、編輯者和讀者共勉。

二〇一四年七月六日

改定於自安東回京途中

— 前 言 —

◇ 王紹培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是一項重大的學術工程，我接到寫這個序言的指令，誠惶誠恐多日，端的是藐予小子，何敢贊一言。

但我亦深知這是一個重溫先賢大哲杰出思想成就的寶貴機會。果然，十余部宗教哲學類著述電子版到手，翻閱起來，雖然難免諸多不便，但靜心瀏覽，不能不生感慨良多。這批著作全部都在民國期間出版。最早的一本是梁漱溟的《究元決疑論》，是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其餘的大部分都出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抗戰爆發之前。想想看，彼何時也，政局動盪不已，軍閥混戰不休，而民不聊生，但學術活動仍然頑強掙扎，開展得如火如荼，且學術質量之高，令人驚訝。

所謂學術質量之高亦不是我輩來信口雌黃。事實上，對於這些前輩學人及其成就，學界早有定評。例如，梁啟超（一八七三年—一九二九年）被公認是清朝最優秀的學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最難以想象的是在他五十六年的短暫生命中，既積極投身從事大量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又能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這是怎麼做到的？曾經看見一則逸聞，說梁啟超每天必打八圈麻將，寫八千字文章，他不少文章是邊打麻將邊口授的，簡直神乎其技了，但不知道真假。本叢書收錄的梁啟超的《中國學術

思想變遷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出版）被學人贊許之為“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梁啟超在經過革命失敗的過程之後，痛定思痛，得出的教訓是要高度重視學術思想，他說：“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梁啟超認為，有新學術思想，就會有新國民，有新國民，就會有新國家新世界。從梁啟超的論述可知，他對哥白尼、培根、笛卡爾、孟德斯鳩、盧梭、富蘭克林、瓦特、亞當·斯密、達爾文等等思想家瞭如指掌。他極為看重思想言論自由，他認為“春秋末及戰國”為中國學術思想的“全盛時代”，而追溯所以致盛的原因，“思想言論之自由”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其餘諸多因素，除了“由於蘊蓄之宏富也”與歷史積累有關，其他“社會之變遷也”、“交通之頻繁也”、“人材之見重也”、“文字之趨簡也”、“講學之風盛也”，也都跟社會自由有很大的關聯。現在的年輕人有時或者會覺得清末民初的人物都是老古董，但看看梁啟超就知道，他的思想之新銳先鋒不在現在很多人之下。正因為梁啟超把學術思想看得如此之重，因此，該書欲總結中國固有學術思想之得失，以西方文化參補之，從而恢復上古與中古時代“我中華第一也”的學術“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百年之後，看見這樣的雄心壯志，真是讓人唏噓不已。

再如錢基博先生。現在的讀者如果知道錢基博大概多是因為錢鍾書的緣故，但錢基博先生本身就是碩學鴻儒，父子同為大師，此等情形較為罕見。《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年出版）亦是錢基博的代表作之一。四書是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亦是儒學的重要原典。錢基博說他在四十歲時遇見梁啟超，梁啟超送他一本《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他有不同看法，於是成就《四書解題及其讀法》一書。錢基博的四書解題，回到朱熹的“大語孟中”的次序，所謂“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指趣”。或則，“先讀《大學》，

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蓋以爲學之程序，而第其書之先後也”。衆所周知的是，錢基博不是那種關門閉戶死讀書的腐儒，而是心憂天下的君子。就在該書的序言裏，他亦不忘表露初衷：“今四十歲，飽更世患，民治革政，共而不和，爭民施奪之既久，寢尋以至今日，又見有專無制，哀哉耗已！末法披昌，人將相食！窮則反本，緬溫故書，然後知聖人憂世之情深，仁民之道大也！繕寫既定，而爲考鏡原流，發明指意，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庶幾尼山正名之意云爾！”在錢基博這樣的學人眼裏，做學問跟憂世仁民大有關聯。

這些學者當中，無疑以梁漱溟（一八九三年——一九八八年）的世俗名氣爲最大，在現當代中國歷史上，梁漱溟是一位罕見的絕不阿世媚俗的有風骨的文人。梁漱溟自謂：“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之後，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着爲了什麼，二是社會問題亦即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總論我一生八十餘年（指十四歲以後）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梁漱溟曾經兩度自殺，可見其苦悶至深。一九一六年，二十三歲的梁漱溟即寫成《究元決疑論》，在《東方雜誌》連載，引起轟動。正因爲是書，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校長延聘，進入北大教授印度哲學。關於《究元決疑論》之緣起，梁漱溟說：“於爾所時，舊執既失，勝義未獲；憂惶煩惱，不得自拔。或生邪思邪見；或縱浪淫樂；或成狂易；或取自經。如此者非財寶事物之所得解，唯法得解……所謂《佛學如實論》與《佛學方便論》之二部，前者將以究宣元真，今命之曰‘究元第一’；後者將以決行止之疑，今命曰‘決疑第二’。世之所急，常在決疑，又智力劣故，不任究元，以是避諱玄談，得少爲足。且不論其所得爲似爲非。究理而先自畫，如何得契宇宙之真？不異於立說之前，自暴其不足爲據。欲得決疑，要先究元。”所謂“究元”，亦即“佛學如實論”，探討宇宙本體問題，揭示佛法的核心教義乃爲“無性”，“無性”亦即“無

自性”，世間萬事萬物皆是因緣和合，並無自體自性，如斯則從根本意義上省悟宇宙人生之真相。所謂“決疑”，亦即“佛學方便論”，討論現象界的問題，以究元所得的佛法宇宙人生真諦來認識和指導現實的社會人生。“究元”是佛教立場的本體論，“決疑”是建基於佛教之上的人生觀。欲得決疑必先究元；先解決本體問題，則人生問題就好順勢而為。值得一說的是，五四時期，中國學術界跟國際社會基本接軌，信息傳遞大體同步。例如，古斯塔夫·勒龐（彼時譯為魯滂）的各種學說都被悉數譯介，如《新物質論》甫一翻譯，即被梁漱溟消化，以茲與佛家性空學說參觀對照，按照勒龐的說法，以太是宇宙的本體，以太的“渦動”即為物質，“渦動”停止物質消滅的過程中派生各種“力”，“力”是同一物的不同形式。梁漱溟認為以太跟佛家的如來藏或阿賴耶相類似，“渦動”相當於忽然念起，“此渦動便是無明”。除此之外，梁漱溟對各種西方哲學瞭如指掌，例如，他以康德的現象與“物如”（物自體）之分，休謨的不可知論，來印證佛家元哲學之三義：“不可思議義，自然(Nature)軌則不可得義，德行(Moral)軌則不可得義。”復以叔本華的盲目衝動和意欲之說，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來論證“人生基本是苦”的結論，唯有以佛法為精神支柱，方能安穩自我，清靜自守。

相對來說，馮承鈞先生（一八八七年——一九四六年）鮮為人知。馮承鈞早年留學比利時，後赴法國巴黎大學，主修法律。一九一一年獲索邦大學法學士學位。續入法蘭西學院師從漢學家伯希和。馮承鈞歸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馮通曉法文、英文、比利時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及古回鶻語、吐火羅語和蒙語八思巴字，並精通中國史籍，在歷史學、歷史地理學、歷史語言學和考古學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在史地研究考證方面卓然成家。馮承鈞畢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邊疆史，著譯既多且精，是民國時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馮承鈞從金石書畫以及方誌內哀集了元代的白話聖旨碑，成為一書，此即《元代白話碑》，概述元朝白話碑文的歷史背

景，並對於元代白話語法加以研究討論。關於《歷代求法翻經錄》，馮承鈞在其叙言中說：“求法傳經二事之重要，已爲西方學者所共知……第此種史料，多散見於釋藏傳記譜錄之中。初學不易尋檢。余不敏特爲鳩集舊文，參以新證，凡關於求法翻經之事，皆撮錄其要……彙爲一編，名曰《求法翻經錄》。”由此可知，該書是一本資料薈萃之編。

另有兩位不大爲後人所知的學者。一位是江恒源（一八八五年—一九六一年）。江恒源是一位教育家，他的《中國先哲人性論》是作者一九二四年用八十天的時間寫成的專著，將先秦到明清之際的諸多先哲跟人性有關的觀點、思想娓娓道來。作者認爲，總體來說，中國哲學的起源，和歐洲有點不同。歐洲哲學以“求知”爲出發點，中國哲學以“利行”爲出發點。歐洲人說“哲學起於驚異”，而中國哲學一切以現實認識爲根據……這幾句話要言不煩，道破中西哲學之差異。另一位是熊夢（一九〇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三一年，熊夢留學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經濟組專門委員。一九三九年出任沅陵稅務局局長。一九四〇年冬掛冠歸里，應聘爲三民中學教務主任。熊夢一生著述頗豐，著有《墨子經濟思想史》、《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江西省財政概況》、《湖南省財政概況》等。其中，《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算得上是中國經濟史的奠基之作之一。該書綜述道儒法墨四家的經濟思想，同時對百家思想多有論略。

另外三位先生，湯用彤（一八九三年—一九六四年）、朱謙之（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二年）、蔡尚思（一九〇五年—二〇〇八年），知名度不大不小，但其實都是極具分量的重要學者。一般認爲，湯用彤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他的《竺道生與涅槃學》是其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竺道生是東晉時期的著名高僧，是鳩摩羅什的弟子。竺道生認爲那些斷了善根的人也可以成佛，他又主張頓悟成佛，這些都不是主流的觀

點。竺道生是東晉最著名的涅槃學者，他把作為精緻哲學形態的般若學和粗俗的成佛說教結合起來，着重闡發涅槃佛性說，認為“真空妙有”契合無間，開創佛教一代新風，因此被尊為“涅槃聖”。朱謙之是二十世紀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東方學家，亦有“百科全書式學者”的美譽。他年輕時曾經短暫出家為僧，後來發現，佛教不能實現自己的夙願，因此跟佛門斷絕關係。他主張宇宙人生是一股真情之流。他的《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九四〇年出版）一書的寫作，歷時五年，他自認為是“最細心結撰的一部著作”。朱先生認為，東西文化各有其自身的歷史特徵，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們同時通過各種途徑接受、吸納對方的影響。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哲學文化給予歐洲思想界的影響歷歷可數。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則以來華的耶穌會士為媒介，中國哲學文化特別是孔子哲學被廣泛譯介到歐洲大陸，成為歐洲理性時代來臨的外來思想條件。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接觸，給世界文明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朱謙之先生的這部重要的著作，對於研究中西方文化史的後來學者，仍然是一座繞不過去的學術高峰。蔡尚思先生是哲學家，亦是中國思想史專家。他出版《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一書時是二十八歲，寫成則是二十四歲，而在此前的二十一歲時，他就寫成了研究孔子哲學、老子哲學和墨子哲學的專著。所謂中國三大思想，指的是老孔墨三家。蔡尚思先生將三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比較對照，細緻而又周全。例如，他認為老子是藝術的，墨子是功利的，孔子則介乎兩者之間；老子以死天為主，活人法死天，無為自然；孔子以天鬼為名，以君王為實，視天子嚴君如天帝鬼神；墨子以活天為主，視死天如活人，兼愛交利……這些比較十分具體，發人深省，後之學者反而不做如此細緻的功夫了。

即使是非常粗略地瀏覽民國學人的著述，也不難發現一點，這些學者何以在年紀輕輕時就已經開始著書立說，而且水準頗高？我們站在新中國的立場回望，覺得彼時天地之舊，但如果他們站在辛亥革命之後前瞻，或許看見的全是風物之

新。因此，當時的人或者滿是志氣，要在新天地有所作為。及至戰亂迭起，他們更是堅定了文化返本開新的決心。從教育的角度來說，當時的精英教育使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是英才，而這些教育英才的人和英才自己也都非常珍惜機會，所以成才率顯然比今天高。中外學術思想交流的順利和及時，也是民國學術思想繁榮的一個原因。我們看梁漱溟等人的書，不難發現他們對國外各種思想潮流都瞭如指掌，各家各派的學說都被拿來為我所用。當然，學術思想的相當自由也保證了這些學者在著書立說時，較少外部顧慮，一心把書寫成、把文章做好就對了。這些其實遠遠不算完美的局面，仍然因為日本人的侵略而被打斷，內戰的影響也顯而易見。及至新中國建立，學術範式、語言、議題、旨趣等等完全轉型，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

因此，今天我們重溫民國學人的思想，除了瞻仰他們曾經到達的思想高度之外，也是順便看看，學術思想在一種相對自然而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呈現出一種怎樣的風貌，結出怎樣的碩果，而於我們中國人會有怎樣的信心跟鼓勵。值得慶幸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又回到了一個總體來說學人可以有所作為的環境中，至於新世紀的學人可以取得怎樣的成就，在很大程度要看個人自己的努力和爭取了。

作者簡介

王季同（一八七五年—一九四八年），名季鏞，字孟晉，號小徐，江蘇省蘇州市東山陸巷人。自幼喜數學，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年）即出版《積較補解》、《泛倍數衍》、《九客公式》等著作，為我國早期介紹西方數學的重要書籍。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在英國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刊上發表有關四維函數求微方法的論文，被稱為“王氏代數”。晚年王季同研究佛學，著有《佛法與科學之比較》、《佛法省要》、《獨立變數之轉換與級數之互求》等。